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文化学系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偶然与必然

——论「四马拒孙」之役对「青马」家族及其同国民政府关系的影响

作者：王璟昆

指导老师：徐启轩老师

第二指导老师：韩孝荣老师

提交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目录

摘要.....	3
致谢.....	4
一、 绪论	5
1.1 研究背景综述.....	5
1.2 前人研究综述.....	8
1.3 论文研究方法综述.....	12
二、 「四马拒孙」之役的背景研究.....	13
2.1 「青马」家族之背景	13
(一) 「青马」家族发展略述	13
(二) 战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19
2.2 孙殿英西进之背景.....	27
三、 「四马拒孙」之役	30
3.1 孙殿英部的西进与国民政府态度的转变	30
3.2 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35
四、 战后分析与影响.....	38
4.1 战后分析	38

4.2 对「青马」家族及其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影响.....	41
五、结论	44
参考资料	47

摘要

中原大战后，长期盘踞在西北地区的「马家军」诸部则因此前的「青藏战争」及马仲英事件与国民政府产生间隙。与此同时，原本从属于冯玉祥部的孙殿英乘机投蒋，并获得蒋介石的准许，得以西进青海。西北诸马不甘外来势力插手西北事务，遂联合起来抗击孙殿英部。随着孙殿英进攻不利，及对时局的通盘考虑，蒋介石转而支持「马家军」抗孙。孙殿英最终全军溃败，本人也被迫下野。战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马步芳也成功取代了叔父马麟成为了青海军政首脑，「青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

致谢

本人于 2017 年离开家乡前往香港学习，这亦是我第一次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因从年幼时就喜欢历史掌故，故而在本科阶段选择了世界史专业，但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最热爱的依然是中国文化，加之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香港作为我进修的目的地。由此，我也有机会进入香港理工大学这间世界知名学府并且认识了许多友爱、博学的老师。

在众多老师中，因为论文选题的缘故，我选择了徐启轩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在完成论文的几个月中，徐老师不厌其烦地教诲我，甚至在我们身处异地时也通过微信语音及电邮的方式对我进行远程指导。同时，韩孝荣老师作为我的第二指导老师，也在论文选题方面给我不少启发。在此，我要对徐老师及韩老师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支持我得以赴港完成学业。以上各方对我的支持都让我心怀感激，今天借此记录之。同时，我也要勉励自己，将尽自己力量传播中国文化作为毕生的目标之一，做到「不忘初心」。

2018年11月30日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综述

自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我国随即进入了军阀割据的状态。1926年，国民革命军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为目的进行北伐，期间诸多地方军阀亦加入北伐行列，但这些地方军阀既保留了原先的编制，又没有撤换主要的指挥将领，所改变的仅仅是部队的番号。¹随着张学良于1928年进行「东北易帜」，国民政府虽完成了对全国名义上的统一。但正如上述，那些参与了北伐战争的军阀得以保存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²

青海地处我国西北，距离国民政府核心统治区较远，且经济水平较低，故而并不能引起国民政府足够的重视。³此外自清末同治回乱以来，青海与相邻的宁夏，以及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一直为几支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马姓军阀所控制，它们互为犄角，统治基础比较深厚，区域内民族、宗教问题又十分复杂，故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外来军阀都很难将自己的势力真正渗透其中。⁴加之国民政府自身历经中原大战、抗日战争以及之后的国共内战，无暇西顾。综上，自蒋介石上台后直至1949年，国民政府始终没有与「青马」进行正面冲突。

「四马拒孙」之役的起因在于孙殿英为求免受「察变」波及，率军西进，

¹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页2。

²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页223。

³ 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页79。

⁴ （美）默利尔·亨斯博格著，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5-6。

意欲前往青海屯垦。对此，西北各地方军阀恐自身势力范围受到削弱，遂采取拒绝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对抗的方式阻止孙殿英过境。孙殿英此举虽已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但随着「察变」的落幕及西北地区各势力矛盾的激化，使得中央对如何重新处置孙殿英部产生犹豫，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由此可见，「四马拒孙」之役前，各方本无主观挑起战争的意愿，故「四马拒孙」有其偶然性；孙殿英西进又使自己与西北地区各地方军阀的利益相冲突，故此役又有其必然性。

再看「青马」方面。「四马拒孙」前，「青马」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西进，冯玉祥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削弱「青马」势力，甚至还试图迫使马麒离开青海。⁵但此后，随着冯玉祥部东归参与中原大战，「青马」势力有所反弹，「青马」领袖马麒在表面拥护冯玉祥的同时与蒋介石暗通款曲，试图自保。⁶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青马」采取羁縻安抚的策略，甚至连此前反对国民革命军的「青马」支系马仲英都被委以 36 师师长之职。⁷然而青海及周围地区的局势并没有就此稳定，先是在甘肃省发生「雷马事变」，其后「青马」本部及其旁系部队更是接连与西藏、新疆爆发战争。于是，蒋介石又借此安插嫡系官员执掌甘肃政局，并派遣中央军胡宗南部进驻兰州。此举证明蒋介石对于西北局势并不放心，故以此将

⁵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 24。

⁶ 马光宗等，《中原大战中的马鸿逵、宁夏三马》（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页 151。

⁷ 毛光远，〈蒋介石对西北诸马军阀军事控制与反控制〉，《甘肃高师学报》，卷 15 期 3(2010 年 7 月)，页 111。

本来同气连枝的「青马」与「宁马」进行战略分割，以防二者联合反抗中央。⁸ 综上所述，自北伐至「四马拒孙」之役前，国民政府对于「青马」的态度可谓表面拉拢，实则意欲削弱之；而「青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不是真心归顺，只是想借此自保，并择机发展。此时的国民政府与「青马」可谓貌合神离。

另一方面，在「四马拒孙」前，「青马」集团内部也存在着重重矛盾。首先是「青马」的支系将领马仲英与「青马」本部间的矛盾。早前，国民军进入西北时，马仲英受马麒唆使发动「河湟事变」。⁹ 事前，马步芳表示将以「死力相助」，但随着马仲英的战败，马步芳旋即把自己与马仲英的联络员处死，并声称自己出兵是为了「追击变兵」。¹⁰ 此后，马仲英脱离「青马」本部，出走新疆。另外，因对青海军政大权的争夺，马步芳与其叔父马麟也产生了对立。1931年马麒去世，其弟马麟在「青马」元老派的拥护下接任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之子马步芳对此深感不满。¹¹ 马麟发布省钞，马步芳则于自己家中印制伪钞，对青海经济进行破坏。此外，马步芳还劫掠马麟的财物，并对马麟外运的皮货强制征税。¹² 由此可见，「青马」各个派系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

透过以上的史实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四马拒孙」之役前夕，「青马」

⁸ 毛光远，〈蒋介石对西北诸马军阀军事控制与反控制〉，页 112。

⁹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略》（兰州：甘肃文史编辑部，1989），页 89。

¹⁰ 王玉贵，《西北马家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页 40。

¹¹ 王玉贵，《西北马家军》，页 30。

¹² 王玉贵，〈马麟、马步芳叔侄相争〉，《民国春秋》，期 2(1998 年 3 月)，页 4。

已然陷入「内忧外患」之中，而此时得到蒋介石授意的孙殿英率部西进对「青马」而言，不啻为雪上加霜。但令人意外的是，此次战役中，「青马」重新取得了国民政府的支持，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战后，「青马」集团不仅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还使其在青海省内的统治达到了巅峰，同时又迫使蒋介石对待「青马」重新采取妥协、安抚的政策。¹³就此，「四马拒孙」之役在偶然间成为了「青马」与中央政府间关系的转折点，处理了此前的「外患」。

至于「内忧」的解决，「四马拒孙」之役则仅起到了催化作用。「四马拒孙」之役后，马步芳的声望因取胜而变得与日俱增，这也使其有契机取代马麟，将青海军政大权握于一手。但从长远来看，马步芳作为当时「青马」军队的实际指挥官，牢牢的掌握军权；马麟虽掌握行政权，但治下金融崩溃，又因此前种种事件无法取得中央政府的信任，其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故这也体现了，「青马」家族内部权力更迭的必然性。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四马拒孙」之役的爆发本身即为偶然性与必然性综合而成的产物。其战后对「青马」家族的影响也同时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

1.2 前人研究综述

中国大陆地区对于「青马」的研究著作相对较多。在专书方面，陈秉渊于1981年所著的《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当属其中较早的作品。陈秉渊人生经历颇为复杂波折，他出生于西宁，早年从事新闻工作，而后步入政坛，在马步芳治下的青海省政府历任要职。国民政府迁台后，陈秉渊归顺中

¹³ 毛光远，〈蒋介石对西北诸马军阀军事控制与反控制〉，页112。

共，并一度参与了青海省文史馆的筹备工作，这也为他日后进行文史研究创造了条件。1961年，陈秉渊开始执笔编写本书，直至1981年才正式付梓。¹⁴陈秉渊曾作为马步芳的手下，加之后来又专门从事文史研究，故而其掌握的资料比较丰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秉渊著书之时许多当事人尚在人世，作者自然会有所避讳，加之文革中作者自身也饱受冲击，本书原稿也几经修改，故而本书难免有所偏颇。而在本书的前言，陈秉渊也自述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揭发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的罪行」。¹⁵可见，这本著作确有其局限性。此后，大陆方面又出版了高屹所著的《蒋介石与青海四马》，本书作者通过查阅南京第二档案馆所存的资料以论述蒋介石与西北各地方政权的关系。¹⁶本书虽积极运用现存资料进行考据，但却忽视了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情况对此关系的影响。此外，对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进行研究的专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刘进所著的《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此书优势在于，作者除了参阅南京、青海两地所存的档案外，也积极查阅了大量当时的报刊杂志，使读者能对当时形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¹⁷不同于其他的著作过于关注西北的各个地方政权，《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一针见血的指出国民政府以甘肃作为经略西北的大本营，

¹⁴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前言。

¹⁵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前言。

¹⁶ 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前言。

¹⁷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前言。

¹⁸以此控制其他地区。

大陆地区关于「青马」研究的期刊论文也数不胜数，在此选取较为有代表性的进行简要介绍。王玉贵所撰的〈马麟、马步芳叔侄相争〉一文着重介绍了马麟死后，马麟与马步芳就争夺青海军政大权问题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斗争，最终以马步芳获胜而告终。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对「青马」集团内部权力交接问题进行研究、论述的一篇论文，而后这篇论文作为一部分收录在了王玉贵所著的《西北马家军》一书中。¹⁹而关于「四马拒孙」之役问题的论文也有不少，如刘东社的〈「四马拒孙」之役新论（上、下）〉一文，其中作者认为蒋介石遣孙殿英部西进并非是蓄意挑起西北各个派系间的矛盾，而蒋介石随后转而支持西北「马家军」也是因为察觉到孙殿英有着「与两广合作及联共联杨虎城的双重反蒋图谋」，²⁰这一观点也与目前传统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而在张嘉选撰写的〈卅年代宁夏「四马拒孙」历史真相刍议〉一文中，作者又认为蒋介石先「挺孙」再「反孙」是因朱绍良起了关键作用，而西北「马家军」诸部因不想自己的势力范围受到侵犯，也积极参与到战争中。²¹综上，较专书而言，关于「青马」研究的论文更为庞杂，涉及的范围也更广，角度和论点也更为新颖。尤其是对「四马拒孙」之役的研究上，也不像专书中论述的那样简略，或因自身立场问题偏听偏信。

¹⁸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页8。

¹⁹ 王玉贵，《西北马家军》，页33-36。

²⁰ 刘东社，〈「四马拒孙」之役新论（上）〉，《陕西教育学院学报》，卷19期1(2003年2月)，页37。

²¹ 张嘉选，〈卅年代宁夏「四马拒孙」历史真相刍议〉，《青海民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1(1990年1月)，页36。

在官方出版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青马」，尤其是介绍「四马拒孙」之役始末的资料，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选编的〈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及续。²²整个档案以〈孙殿英致鲁雨亭电〉，孙殿英提议自己将率军西屯为始，至〈汪精卫致傅作义电〉，汪精卫通告傅作义，孙殿英部已全部缴械为止，总共收录了 84 段资料，其中主要以电报、书信为主。此外，在 1949 年出版的各地地方志以及文史资料中，对「青马」也有所涉及，但由于这部分资料过于零散，故而不加以赘述。

港澳台方面，只有台湾学界对于「青马」有着较为有限的研究。专书方面，台湾青海省旅台同乡会的高文远参考清代奏章及相关资料所著的《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²³一书主要从马麒的生平入手，进而叙述了「青马」家族在青海逐渐扎稳根基的过程。政治大学王立本所著的《决战大西北——剖析国共内战之西北战场（1945-1949）》则主要着眼于国共内战时期的西北地区论文方面，除了传统学术专著所用的档案外，作者也积极运用战争中的战术理念为读者进行深入解析。²⁴也只有王立本的博士论文〈国共内战在西北——从陕西鏖兵到兰州对决〉²⁵和政治大学郑国良所著的硕士论文〈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台湾地区官方出版的《戡

²² 该档案整理分为两次发表。其中〈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载于《民国档案》，期 4(1994 年 10 月)，页 27-44；〈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载于《民国档案》，期 1(1995 年 1 月)，页 7-19。

²³ 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台北：青海省旅台同乡会，1990），前言。

²⁴ 王立本，《决战大西北——剖析国共内战之西北战场（1945-1949）（上）》（台北：老战友工作室，2011），绪论。

²⁵ 王立本，〈国共内战在西北——从陕西鏖兵到兰州对决〉（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5）。

乱战史——西北地区作战》一书则对国共内战时期西北战场上国军的资料有着详细的介绍，该书汇总了诸多的档案，列有详细的战斗序列，并且还对国军为何在西北战场失利作出分析并进行了检讨。

比较两岸学界，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方面出版的专著由原先单纯围绕「青马」家族及其统治展开论述转向多方面、宽领域的研究。但是，正如刘进在书中所提到的「本人在青海省图书馆和青海省档案馆发现，青海建省数十年，所遗留的当时档案、报刊为数极少，至于关乎军政大计的档案资料更难寻觅」，²⁶档案的缺失始终是困扰大陆学者的一个主要问题。而台湾方面，虽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多，但相信随着两岸间日益密切的学术往来，必将有更多学者对此方向进行研究。

海外对于「青马」的研究不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博格(Merrill R Hunsberger)所著的《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Ma Pu-fang in Chinghai Province, 1931-1949)。本书为作者于1978年在坦布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完成此书，作者曾于1970-1972年期间多次前往台湾查阅相关档案，并对「青马」家族成员及旧时幕僚进行访谈。故此，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已称得上十分全面。²⁷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本书中文版于199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为青海省历史学者崔永红。全书以马步芳在青海的统治为重点，通过将「青马」

²⁶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页23。

²⁷ 默利尔·亨斯博格(Merrill R Hunsberger)著，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前言。

与桂系、晋系及川系等军阀进行比较，来突出其独特性。但相对的，亨斯博格与同时代的中国大陆学者一样，将关注点集中在「青马」家族对地方的统治，而对其与国民政府关系的较为简略。并且，如前所述，作者创作此书时虽已尽力搜寻材料，但仍受彼时中美关系与海峡两岸关系所累，并未有机会前往青海当地探访、查阅大陆地区相关档案，只能以听赴台的相关人士口述来进行弥补，²⁸这也难免会对本书的叙述上的准确性和观点造成一定影响。

通过综述可以发现，大陆学界对于「青马」的研究较多，而港澳台及国外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以「青马」对地方的统治为主。而对「四马拒孙」之役及其背后的前因后果，以及其对「青马」家族内部权力更替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较为有限，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

1.3 论文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史实分析法和史料分析法，即对史实没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分析；对目前学界仍具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则先列出前人研究的成果或是推断，之后笔者再根据当下所公开掌握的史料进行分析，并总结出自己的看法。

具体到各章节，笔者在对「四马拒孙」之役，「青马」方面背景进行介绍、研究之时，将主要采用史实分析法。所参考的史料主要包括：民国时期的职官记载；1949年后官方陆续组织整理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事件相关人员的回忆录、出版刊物及往来电报等。在这一部分的章节划分上，笔者将自

²⁸ 王立本，〈八十年代以来青海史研究回顾：以 Merrill Ruth Hunsberger《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一书为中心的讨论〉，《辅仁历史学报》，期 16(2005 年 7 月)，页 326-328。

马海宴起兵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这段时间内归入「『青马』家族之背景」小节，而后则归入「战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小节。而在对孙殿英方背景，尤其是其西进原因进行介绍、分析时，笔者将采取史料分析法，针对此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再给出自己的看法，并通过史料来佐证自己的理由。

至于战役的爆发一章，笔者则将采取夹叙夹议的写法，原因在于整个战役的进程与结局，史料记载颇为详细，但对于战争背后各方的想法及背后角逐，则需要进行剥茧抽丝般的分析，故此笔者认为此段叙议结合比较恰当。

战后分析与总结这两章则主要是由笔者进行分析总结，故而在此两章史料只是起补充说明作用。

二、「四马拒孙」之役的背景研究

2.1 「青马」家族之背景

（一）「青马」家族发展略述

「青马」家族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末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青马」家族的始祖马海宴本从事药材、木材生意，其表兄马占鳌在甘肃起兵，马海宴遂加入其中。²⁹1872年，马海宴随马占鳌一起降清后任「中旗副旗官」，并隶属于董福祥部驻扎蓟州。³⁰庚子事变时，马海宴同马福祿、马福祥兄弟一起随董福祥率军拱卫京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离北京后，马海宴等人奉旨护驾。

²⁹ 张中复，《清代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页95。

³⁰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6。

行至宣化时，马海宴病故，其部由长子马麒统领。³¹庚子事变后，马安良任甘州提督，马麒为其所属，驻扎在扎巴镇（今青海省化隆县）。1906年，在马安良保荐下，马麒出任花翎衔循化营（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参将，由此他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循化，这也为日后「青马」家族统治整个青海省奠定基础。³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新军在张凤翔的领导下起义，时任陕甘总督的长庚和陕西巡抚升允命马安良所部前往镇压革命，此时马麒与其弟马麟受命进攻宁夏府城。二人攻占城池之后纵兵劫掠，后更是以「善后」为名向当地富户勒索财物，此举使得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甚至当陈秉渊于1929年路过宁夏，当地耆老与其交谈时，提及马麒兄弟的暴虐行径，仍「谈虎色变」。³³

之后，马麒率部至陕西乾县与马安良会合，参与对陕西革命军的镇压。双方相持不下之际，马安良得知宣统帝逊位，遂一面向上级请求撤兵，一面私下与陕军领袖张云山会面，以表拥立共和之心。1912年3月，甘肃布政使赵维熙、甘肃咨议局局长张林炎和新疆巴里坤镇总兵马福祥联名通电，宣布承认共和，马安良率军回到甘肃，马麒也回驻河州。³⁴

清末民初的甘肃省包括如今的甘肃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幅员

³¹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28。

³²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8。

³³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9。

³⁴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历史纪要》（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269。

辽阔，民族众多，再加上处在朝代更迭之时，可谓问题复杂。甘肃省宣布承认共和后，原清朝陕甘总督长庚去职返京，赵维熙则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甘肃都督，成为当时甘肃省名义上的军政首脑。赵维熙为了控制甘肃实权，通过调换防区等手段试图制衡甘肃各个军队派系，但因赵维熙出身文职，并不能服众，加之自清末回族起义以来，甘肃境内回兵汉兵素有间隙，故而制衡之策未能奏效，反倒使坐镇省城的马安良趁势坐大。随着马安良升任甘肃提督，马麒也相应升至洮岷协和总镇，其势力进一步扩大。³⁵

1912年，西宁镇总兵一职出现空缺，袁世凯本欲委任马福祥接任该职，但马福祥自觉在青海根基不稳，若前往赴任恐会受制于人，故而不肯赴任。³⁶马麒在青海地区经营多年，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一面请求马安良出面向北洋政府推荐自己，另一面又透过时任甘肃巡警道的赖恩培向赵维熙贿赂。赵维熙也欲借此分化马安良的势力。³⁷

同时，马麒还使用暴力手段铲除自己接任西宁镇总兵一职的阻碍。时任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的李镜清一向看不惯马安良和马麒飞扬跋扈的作风，故不仅反对马麒出镇西宁，同时还欲立案查办马麒部军纪不整之罪，至此马安良与马麒已欲除李镜清而后快。³⁸李镜清平素亦与赵维熙关系恶劣，故马麒治军不严一事并未受到深究。赵维熙反而借此扩散流言，挑拨汉、回矛盾，致

³⁵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35。

³⁶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页64。

³⁷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页66。

³⁸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页65。

使李镜清自感无法再在兰州立足。³⁹李镜清返回临洮老家避祸，但马麒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1912年7月17日夜，李镜清被马麟义弟马同等人杀死于家中，⁴⁰尸体更是被截掉一根手臂。⁴¹李镜清之死使甘肃官场一时间人人自危，在案发仅一月后，马麒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担任西宁镇总兵之职。至此，通过自己软硬兼施的手段，马麒将其势力进一步扩大。

其后，马麒为进一步控制青海地区，又设计驱逐走了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廉兴去职后，北洋政府为更好的拉拢青海地区各个民族势力，将青海办事长官一职裁撤，又于1915年10月将西宁镇总兵一职改为甘边宁海镇守使，仍由马麒担任，⁴²并且核准马麒组建一支「西宁青海巡防马步全军」（简称宁海军）。宁海军的建立标志着马麒在军事上已经独立于马安良派系，⁴³在政治上已将青海地区变成了自己辖下的「独立王国」。

1918年，马安良去世，其子马廷勳接任为凉州镇守使，势力大不如前。1919年12月，时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因自己所依附的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故而宣布下野。面对督军一职的空缺，甘肃省内各镇都跃跃欲试。当时省内八镇大致分为回、汉两系。回系各镇自马安良死后并未出现可以「一家独大」的强镇，故而经过各方思虑和妥协后，回系推荐宁夏镇守使马福祥

³⁹ 韩定山，〈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局〉，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页32。

⁴⁰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页65。

⁴¹ 韩定山，〈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局〉，页32。

⁴²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308。

⁴³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22。

接任甘肃督军。与此相对，汉系则推出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为代表。⁴⁴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针对甘肃省内如此情况采取折中之策，他从绥远将蔡成勋调赴甘肃担任督军兼任省长，蔡未到任之时督军一职由陆洪涛暂代，省长一职则由陈闾暂代。1921年6月，徐世昌又下令将未到任的蔡成勋改任为江西督军，并将代理甘肃督军的陆洪涛转正。⁴⁵对于此项决定，马麟等人颇有异议，甚至一度公开宣布与陆洪涛对立。但最终在甘州镇守使马麟的调停下，回、汉两系达成表面和解。⁴⁶

1924年，马麟派朱绣前往洛阳面见吴佩孚并提出《经营青海意见书》，旨在将青海脱离甘肃省，重新划为特别区，从而使「青马」势力进一步独立。但吴佩孚提出以马麟出军饷一百万大洋为条件，马麟只好就此作罢。⁴⁷其后，段祺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于1925年召开善后会议，宁海地区作为单独的行政地区之一受邀出席，马麟遂派朱绣作为领队进京。朱绣趁机面见段祺瑞提出《开发青海意见书》，再次提出将青海划为特别区的建议。然而此时的段祺瑞亦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统一全国中，无暇顾及地处偏远的青海地区。朱绣使命未达，只得失望而归。至此，马麟为青海独立建区所作出的两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⁴⁸

1925年，冯玉祥接受段祺瑞的任命，担任西北边防督办。而后，陆洪涛

⁴⁴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28。

⁴⁵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310。

⁴⁶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31。

⁴⁷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页82。

⁴⁸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页32。

因病去职，冯玉祥遂又受命兼任甘肃军务善后督办。冯玉祥派遣部下刘郁芬为总指挥，率军先行进入兰州。此时甘肃省所辖八镇仍由汉、回两系把持，而兰州城内也存有以李长清、包玉祥为首的原陆洪涛部队，可谓形势复杂。针对于此，刘郁芬设计先将李、包二人除掉，稳定兰州城内的局势，而后又对其余各镇威逼利诱，一时间内甘肃省内各派人人自危。⁴⁹

在此阶段，「青马」家族对冯玉祥势力进入甘肃颇感无奈，一方面「青马」不愿受冯玉祥的节制，甚至一直在谋划让青海地区从甘肃省内独立出去；另一方面，马麒又自忖「青马」并没有可以与冯玉祥部所抗衡的实力，故只能对冯玉祥虚与委蛇，以求自保。以下之实例足以印证此点：1925年11月，张作霖联合阎锡山进攻冯玉祥，冯玉祥下令命马麒部前来助战。马麒虽不愿出兵，但迫于现实压力，只得让侄子马步元率领仅仅千余人马奔赴包头参战。马步元趁冯玉祥部布阵转移之时偷偷绕过驻地，率领人马逃回青海，其所属人马不仅丝毫无损，反而偷得一批战利品回来。⁵⁰由此可见，马麒虽不愿屈从于冯玉祥，但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表达不满，只能以阳奉阴违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势力。

1926年，冯玉祥于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宁海军也被编入国民军队伍，并受获番号「暂编第二十六师」，马麒与其弟马麟分任正、副师长。⁵¹其后，冯玉祥一面将林竞任命为西宁行政区行政长，一面又将马麒

⁴⁹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马步芳家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页41。

⁵⁰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略》，页88。

⁵¹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23。

原来的甘边宁海镇守使改为青海护军使⁵²。此举使青海地区政治与军事权力分离，「青马」的势力也受到了削弱。1927年，冯玉祥先借先前「青马」与藏区的矛盾为由，设立拉卜楞设治局，使该区域从马麒辖区中脱离；而后，又任命马麒为青海省委委员，⁵³命其前往兰州赴任。马麒看出冯玉祥此举为「调虎离山」之计，遂称疾不往，冯玉祥未避免再生事端，也只得作罢。至此，在冯玉祥主政西北时期，「青马」家族虽被削弱，但仍旧保持了自己相对的独立。

「青马」家族自清末自马海宴随马占鳌起兵始，至马麒雄踞青海地区，仅凭历史机遇和两代人的努力，就从依附于他人力量的「小跟班」，阴错阳差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军阀势力。但同时，由于「青马」的不断壮大，西北地区其他势力对其的戒备心也不断增强，这也招致了冯玉祥对「青马」的打压。

（二）战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相较于之后的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而言，「四马拒孙」之役前，「青马」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可谓十分微妙。在此阶段，「青马」为扩大势力范围，屡次参与到西北地区的局部战争中；而与北洋政府时期对西北地区的「疏于管理」相比，国民政府在经过「宁汉合流」，对国民党势力进行内部整合后，也开始有精力对西北地方势力进行整治，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和目标不同，自然会导致双方产生矛盾。但面对矛盾，双方都没有选择直接采取武力方式解

⁵²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315。

⁵³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316。

决，「青马」以挑动、参与西北地区各势力战争的方式来试探国民政府的态度和管理能力；而国民政府方面则以政治布局为主。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率主力部队东进，欲与南路的国民革命军会师于中原。此消彼长，冯玉祥的离开也使得前一阶段备受打压的「青马」有了重新扩大势力范围的机会。在此背景之下，西北地区爆发了马仲英领导的叛乱。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是马麒的族侄，并在宁海军中任职，故可算「青马」支系。马仲英之父马宝，曾因粮款问题作为代表与时任河州镇守使的赵席聘交涉，却反被扣押，而后刘郁芬恐马宝参与「回变」，将其处死。⁵⁴而马麒亦深恐冯玉祥对「青马」的打压，遂暗中唆使与冯玉祥势力有杀父之仇的马仲英起兵叛乱。⁵⁵1928年4月，马仲英携心腹潜入循化夺取了一批军用物资，而后在河州召集人马，组建「黑虎吸冯军」，起兵反对冯玉祥。⁵⁶冯玉祥遂遣孙连仲、刘郁芬率兵平乱。

针对于青海时局，马麒先是公开表示自己所辖部队与马仲英部本为同气连枝，随着马仲英率军叛乱，自己的部队也可能受到影响，⁵⁷其目的在于欲以此为筹码换取优渥的安抚条件；而后又招纳被刘郁芬驱逐的凉州镇守使马廷勳，并赠给他子弹20万发，马步士兵十营，助其夺回地盘；⁵⁸最后则一手策

⁵⁴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马步芳家族》，页46。

⁵⁵ 马丕烈，〈马仲英起事与三围河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2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89。

⁵⁶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页88。

⁵⁷ 陈少校，《西北军阀记》（香港：致诚出版社，1981），页43。

⁵⁸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页89。

划了「老鸦峡刺杀事件」，除掉了曾有功于自己但却被怀疑私通国民军的朱绣、周希武。⁵⁹至此，马麒乘冯玉祥主力东进之时，煽动并利用马仲英叛乱，意欲挽回前度被打压的劣势。

然而，马仲英叛乱的连锁反应却超出马麒的预料。1928年9月，经过冯玉祥的运作，青海、宁夏从甘肃省内独立，⁶⁰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马麒任青海省建设厅长。⁶¹冯玉祥此举目的有二：其一，青海、宁夏独立设省，中央政府依法有权对省内官员进行任免，这样可以有效地对「青马」、「宁马」进行遏制；其二，则是因1928年7月，冯玉祥同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协定缩编军队，但若将甘肃一省分为三省，冯玉祥则可增编军队。⁶²马麒图谋良久而不可得的事，却阴差阳错的被夙敌一手促成，可谓颇具讽刺意味，毕竟青海独立的目标达成，马麒也在新设的青海省政府内讨到了官职，故还是对此表示支持。孙连仲进入西宁后，马麒自觉实力悬殊，主动交出军政大权。彼时，马仲英部在河州受挫，正欲进军青海，孙连仲闻讯遂请马麒出面招抚、调停，马麒以其弟马麟为使前往马仲英驻地。马麟甫至营地，未及对话，坐骑便被击伤，只得仓皇逃回西宁。马仲英拒绝马麒兄弟的招抚后，认为西宁城中必会加强备战，故而转攻周围的湟源县。⁶³当时，马麒族侄马步元奉命镇守湟源，马仲英逼近湟源时，马步元部下士兵哗变，打开城门迎接马仲英部

⁵⁹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略》，页89。

⁶⁰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138。

⁶¹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933。

⁶²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页140-141。

⁶³ 刘凤翰，《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 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93），页267-268。

队。两股部队合流后共同洗劫湟源城，屠杀汉、回人口约两千四百余人，其后又引起了当地汉族民众针对回民的仇杀，⁶⁴史称「河湟事变」。孙连仲派兵前往湟源围剿，马仲英兵败逃往宁夏，马步元畏罪自杀。

此后，马麒所辖军队虽偶有人心浮动，但始终并未与中央政府发生正面对抗。孙连仲顾忌以「青马」为首的青海地方势力，也对马麒以礼相待，甚至还将马步元的尸体迎回，并按伊斯兰教礼节下葬，以此安抚人心。⁶⁵在孙连仲主政青海期间，「青马」势力虽仍受到压制，但是在马仲英叛乱中，「青马」没有趁机反抗中央政府统治；而中央政府方面则采取恩威并施的态度，既没有放任「青马」坐大，也没有激起其反抗，故而孙连仲曾说：「马家始终站在中央这一方面，很合作的。」⁶⁶

1929年8月，冯玉祥调任孙连仲为甘肃省主席，由高树勋代任青海省主席；未几，又将高树勋调往甘肃，由马麒代任省主席，⁶⁷至此青海大权又落入「青马」家族之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马麒采取观望态度，在冯玉祥败局已定之时，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1931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任命马麒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青海地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⁶⁴ 宋干臣，〈马仲英、马步元屠杀湟源县记略〉，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 122-124。

⁶⁵ 孟企三，〈我对孙连仲主青主甘期间的一些回忆〉，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页 81。

⁶⁶ 刘凤翰，《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 第二册》（台北：国史馆，1993），页 757。

⁶⁷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 933。

同年8月，马麒病逝，马麟接任青海省主席，⁶⁸「青马」家族的「马麒时代」就此结束。

关于马麟的接任，期间还有一段插曲。1931年，马麒于上五庄水峡养病，当时马步芳正处于率军战胜马仲英归来的途中。行至水峡，父子二人相遇，马步芳陈述战情。马麒良心发现，感慨于同族间的骨肉相残，回到西宁后便郁郁而终。彼时对于马麒的继任者，「青马」家族内部意见不一，少壮派和马步芳本人都认为父死子袭，天经地义。加之自「青马」自投蒋后，马步芳被委任为新编第九师师长，实际掌握青海全省军权，故军、政权力合一理所应当。但元老派则怕马步芳上任后，任用年轻官僚，自己遭受排挤，遂以马步芳未担任过省政府委员为由拒绝马步芳接任，并一致表示拥立马麒之弟，时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马麟接任青海省主席一职。其后元老派的代表黎丹、魏敷滋及杨希尧等人联名通电请命中央，中央遂任命马麟为新一任青海省主席。自此，青海省军、政分离，马步芳对马麟及「青马」元老派仇恨在心，叔侄间隔阂也日益加深，这也为「四马拒孙」后，马步芳夺权事件埋下伏笔。⁶⁹

马麟继任不久，甘肃省爆发了「雷马事变」，又将「青马」家族拖入事端。驻守兰州的孙连仲旧部雷中田与蒋介石任命的甘青视察员马文车不满中央政府对甘肃省的人事安排，扣押了中央委任的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宣布组

⁶⁸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933-934。

⁶⁹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页94-95，120。

建甘肃省临时政府。雷中田任全省保安总司令，马文车任省政府主席兼教育厅长。⁷⁰在「雷马事变」前，冯玉祥曾经命亲信李世军捎信给雷中田，煽动其以「暴动手段」发动军事政变；马鸿宾被扣押之后，又要求雷中田「杀马」。关于是否「杀马」，甘肃省内部也有诸多分歧：雷中田愿意服从冯玉祥指令，除去马鸿宾；而时任省会公安局长的高振邦则拒不交出马鸿宾，甚至不惜为此「倒雷」。⁷¹

「雷马事变」爆发后，中央政府不停向甘肃省施加压力，以冀事件得以解决，马麟也随之表示愿出面调停。魏敷滋受马麒之命前往兰州协商释放马鸿宾事宜，雷、马对此只能虚与委蛇，再加上甘肃省内部仍未就如何处理马鸿宾达成共识，「青马」的第一次调停以失败告终。不久，马麟亲率军队由青海出发前往新城进行调停，雷、马遣使迎接，甘宁青各界也以为事变可以就此落幕。⁷²然而，冯玉祥却指示雷中田不要释放马鸿宾，甚至称若释放马鸿宾「等于自杀」，⁷³雷、马遂不同意释放马鸿宾，「青马」第二次调停亦未达成目标。

吴佩孚突然赴甘，使事件出现转机。1931年10月，吴佩孚致信马文车，

⁷⁰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38。

⁷¹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变〉，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139-144。

⁷² 张慎微，〈雷马事变见闻〉，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126-127。

⁷³ 「冯玉祥覆雷中田、高振邦电」，1931年10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陈兴唐、韩文昌、潘缉贤，〈冯玉祥与甘肃雷马事变〉，《民国档案》，期3(1995年7月)，页98。

称将要前往甘肃，与马共商抗日大计。⁷⁴11月7日，吴佩孚抵达兰州，受到雷、马二人热烈欢迎。冯玉祥虽然再次警告雷中田：「吴将到兰之后，虽暂可相安一时，俟其与各方联络妥协之后，则甘省之统治者将为吴氏所专。」⁷⁵但雷、马二人介于甘肃省内外之压力及吴佩孚所言之「抗日」大义，下令释放马鸿宾。

马麟见吴佩孚圆满解决「雷马事变」，遂于11月领衔，与甘、宁、青、新、川五省军政长官联名通电，宣布支持吴佩孚主持抗日事宜。⁷⁶针对于此，蒋介石命杨虎城出兵甘肃解决「雷马事变」余绪，以防吴佩孚趁机东山再起。杨虎城部下孙蔚如与甘肃地方军阀陈珪璋、鲁大昌联手击溃雷中田、马文车和吴佩孚，重新夺取兰州。⁷⁷但介于「雷马事变」的爆发，中央政府并不再认为马鸿宾具有能力统领甘肃，故而没有重新命马鸿宾赴兰州履职；同时蒋介石对西北地方势力并不信任，故而也未任命对平定事变有功的孙蔚如为甘肃省主席，而是直接从中央派邵力子主政甘肃。⁷⁸「雷马事变」及其衍生出来的风波就此平定，冯玉祥与吴佩孚东山再起的愿望也随之破灭。

⁷⁴ 吕配懿提供，金沛仁说明，〈雷马事变前后马文车之函电稿〉，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页 165。

⁷⁵ 「冯玉祥覆雷中田、高振邦急电」，1931年10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陈兴唐、韩文昌、潘缉贤，〈冯玉祥与甘肃雷马事变〉，《民国档案》，期3(1995年7月)，页98。

⁷⁶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页72。

⁷⁷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45。

⁷⁸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918。

对于「青马」方面，「雷马事变」为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首先，是上文提到的马麟通电支持吴佩孚，这也成为蒋介石下令通过军事手段处理「雷马事变」的直接原因。⁷⁹另一点则更为严重，1931年5月，以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为首的两广军阀在广州组建「广州国民政府」，意图北伐反蒋。「雷马事变」爆发初期，冯玉祥为了笼络「青马」，曾向广州方面推荐由马步芳担任甘肃省陆军第五师师长。⁸⁰彼时，日寇入侵在即，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则疲于应对「剿共」和国民党分裂势力这双重压力。此时「青马」如此首鼠两端，自然会引起蒋介石对其的不信任与反感。

然而，此后发生的「青藏战争」让「青马」与中央国民政府的关系出现了转机。1932年，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的唆使下，以介入青海地区黄教、白教寺院争端的名义出兵青海玉树，挑起战争，⁸¹之后更是包围了青海南部重镇结古。⁸²「青马」曾派使者持马麟、马步芳所写的信件前往藏军军营，欲沟通解决，然而遭到拒绝，⁸³「青马」只得诉诸于武力解决。「青马」援军在马步芳的指挥下驰援结古，击溃了包围该城四个月的藏军，而后马步芳更是一路

⁷⁹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44。

⁸⁰ 「蒋中正致杨虎城电」，1931年9月11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410。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39。

⁸¹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页117-118。

⁸² 《青海三马》史料编辑组，〈青海战争的内幕〉，收入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14》（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131。

⁸³ 「马步芳致甘肃省主席邵力子电」，1932年7月16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053。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57。

追击至川、青、藏边界的青科寺，才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停止进兵。⁸⁴西藏当局本以为有英国背书，有恃无恐，然而军事上的失利迫使其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和谈。

经此一役，「青马」不仅改善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赢得了舆论一致好评，还获得了许多实质性利益。首先是「青马」借整备边防的名义从中央获得大量军需物资，据统计中央前后划拨给「青马」总计「枪一千余枝、子弹二十万发、机枪四架、无线电五架以及军费四十万元」。⁸⁵更为重要的是，「青马」借此得以巩固、扩大其势力范围。马麟以「巩固边防」为名，上报中央要求将拉卜楞寺划归青海，⁸⁶而后又请行政院出面将玉树、果洛地区设为囊谦、同德县，以加强统治。⁸⁷至此，「青藏战争」中「青马」成为了实际上的最大赢家，而中央除为「青马」提供装备外也没有牵扯进更多的兵力、资源，随着战争的平息，中央与青海地方达成了双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青藏战争「青马」方面的实际统帅，马步芳也用这场胜利为自己博取了相当的政治资本。

⁸⁴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十七册）》（台北：国史馆，2005），1932年10月13日条，页136-138。

⁸⁵ 「邵力子呈蒋中正电」，1932年8月16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053；「邵力子转呈马麟、马步芳呈蒋委员长电」1932年10月28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061；。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62。

⁸⁶ 「马麟呈蒋中正电」，1933年5月5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086。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61。

⁸⁷ 〈青海省增设县志〉，1933年12月1日、1935年5月11日，国史馆藏，《民国政府档案》，缩印号：258/2082。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61。

「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在名义上统辖全国的中央政府，而冯玉祥因参与了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组建，得以保存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故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青马」与中央的关系实际上是其与冯玉祥关系的延续。马仲英起兵反冯，本是受「青马」主流煽动，但随着青海独立建省和「青马」对马仲英的失控，马麒转而与中央合作，赢得了时任省主席孙连仲的赞许。冯玉祥于中原大战中失败，其在西北的布局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前给中央政府留下较好印象的马麒顺利接任青海省主席。至此，「青马」在青海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彻底形成。马麒去世后，「青马」家族内部针对继任者人选出现分歧，最终马麟接到中央的任命，继任省主席。但马麟的政治手腕与马麒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马麟在「雷马事变」中摇摆不定的表现和蒋介石对冯玉祥、吴佩孚的戒备，直接导致杨虎城部进入甘肃平乱。此后，蒋介石将自己的幕僚邵力子直接从中央派往甘肃，接替受「雷马事变」影响的、属于地方派的马鸿宾，「空降」成为省主席，都证明了蒋介石对以马麟为首的西北地方势力失去了信任。在「青藏战争」中，「青马」抵御了藏军的进攻，受到了中央和舆论的嘉奖。但我们也应看到，「青藏战争」的爆发本身就是因「青马」的势力范围受到了侵损，并不是「青马」有意为之。此外，从战争中「青马」也得到了诸多实际利益。彼时，中央政府正因日本问题而焦头烂额，自然也乐得提供装备给一个「打手」替自己解决问题。故而，我们与其说「青藏战争」的胜利是中央与地方合作而成，毋宁说这是双方互相利用的产物。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四马拒孙」前，中央与「青马」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就对地

方管理而言，中央对于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的控制也比较薄弱。这也从侧面印证「四马拒孙」成为了中央与「青马」关系改善的偶然转折。

2.2 孙殿英西进之背景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他早年曾辗转依附过姜桂题、憨玉昆等人。⁸⁸国民军北伐之时，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实力较小的孙殿英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收编。⁸⁹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孙殿英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并接受改编，其间孙殿英曾盗掘清东陵，时人称其为「东陵大盗」。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巨大轰动，满清遗老遗少要求将孙殿英法办，然而孙殿英则将部分盗墓所得之珍宝用于疏通关节，故最终逃脱处罚。⁹⁰中原大战中，孙殿英先依附于冯玉祥，之后又降于中央政府。1933年，孙殿英受命率部去青海屯垦，就此拉开了「四马拒孙」之役的大幕。

至于孙殿英缘何去西进屯垦，在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杨效平认为，孙殿英率军西进，是由蒋介石授命的，整个「四马拒孙」之役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一次以消灭异己为目的的不义之战」；⁹¹郭绪印的观点则更为全面，他提出「蒋任命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一箭三雕，(1)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联合；(2)可调动马氏打

⁸⁸ 程一民、李鸿庆，《盗陵将军孙殿英：中校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页5、10。

⁸⁹ 程一民、李鸿庆，《盗陵将军孙殿英：中校秘书回忆录》，页14。

⁹⁰ 程一民、李鸿庆，《盗陵将军孙殿英：中校秘书回忆录》，页32、46、48。

⁹¹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页118。

击孙军; (3) 可在孙马之战中，削弱西北诸马，最终使各方俱伤」，⁹²以上种种观点或笼统或具体，但都认为是蒋介石一手促成了孙部的西进和之后的「四马拒孙」之战，但随着之后整理出版的《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这种看法便产生了争议。孙殿英曾在 1933 年 6 月 8 日致鲁雨亭的信中曾提到「此次察变，谨遵指示办理，刻函欲远离漩涡，移屯边荒。况战事结束，大军云屯，非切实缩编，实不足以差其后。职意我国兵士素乏专技，一离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实昭昭具在，与其裁而遗祸于社会，不如留而兴利于国家，屯垦实边实为上策。职不敏，愿率所部移屯陕北、绥西边荒，以为之倡。伏乞转陈蒋委员长俯成职志，则数万之众将永能自食其力，以图生产，且西北边区辽阔，容量至宏，如能调军队屯戍以充实之，亦谋国之要图。」。⁹³通过对以上史料的分析，则可知去西北屯垦之建议是孙殿英本人提出的，只不过孙殿英心仪的驻扎地点并非青海而已。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孙殿英主动提出西进屯垦抑或是蒋介石任命孙殿英前往西北，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孙殿英也有着主动西进的动机与理由。1933 年，孙殿英奉命率军前往热河与日军侵华部队作战，孙殿英部作战勇猛，但终究还是落败。同年，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中央政府对此持猜忌的态度，并在往来电文、信件中称之为「察变」，而此时的孙殿英部正好驻扎在热河——察哈尔一线。对于长期游走于各大军

⁹²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 533。

⁹³ 「孙殿英致鲁雨亭电」，1933 年 6 月 8 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期 4（1994 年 10 月），页 27。

阔势力且又曾是冯玉祥旧部的孙殿英，蒋介石自然是颇为猜忌。孙殿英也自知时局敏感，加之适逢新败，故亦欲「远离漩涡」。中央政府方面本就忌惮孙、冯联合，孙殿英主动提出移垦一事正和蒋介石心意，故而顺水推舟，同意孙殿英西进。

孙殿英获许西进，但屯垦地点并非自己当初提议的「陕北、绥西」，而是青海，这又是为何？盖因孙殿英所部人数甚多，内地各省并无余力安置其军队，故何应钦建议蒋介石将孙部的驻扎地点设为新疆或青海。⁹⁴对此，蒋介石也顾虑颇多：新疆局势本就复杂，若将孙殿英调往新疆恐使混乱加剧；反之若使孙部前往青海，则需使其借道兰州，亦有生事端之虞。⁹⁵最后，国民政府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遂命孙殿英率部赴青海屯垦，但又考虑到「青马」驻地为青海东部，孙殿英贸然进军青海恐与其发生冲突，于是特意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意欲将两者的势力范围分割开来。⁹⁶再者，就孙殿英方面，有学者认为其接受任命未必真欲履职屯垦，而是「假屯垦，真图存」，即以中央的任命为自己率军西进的大义名分，实则图谋割据西北。

97

通过本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昔日学界的推断，孙殿英前往青

⁹⁴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呈南昌委员长蒋中正电」，1933年6月19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098。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81。

⁹⁵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81。

⁹⁶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82。

⁹⁷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台大历史报》，期36（2005年12月），页154。

海屯垦并非蒋介石强行施加的命令，而是出自其个人建议，只是最终成行的目的地并非自己最初所愿而已。蒋介石将青海设为孙部驻扎场所，固然有欲借其控制、分割「青马」势力范围的打算，但从其主观上并没有使其与西北诸马爆发战争的考虑，甚至还感叹过「孙殿英屯青命令发表，青海亦一大患，茫茫前途，不知所止」。⁹⁸由此可见，「四马拒孙」之役的爆发实属孙殿英和中央政府的意料之外。

三、「四马拒孙」之役

3.1 孙殿英部的西进与国民政府态度的转变

孙殿英在接受中央任命后遂率部西进，其间孙部曾在包头停留并向中央要钱要饷，并在包头当地强行向百姓摊派军费，蒋介石曾据此认为孙殿英部不会继续西进，并以此安慰「青马」、「宁马」。⁹⁹但出乎蒋介石预料，孙殿英部于1933年9月24日开始集结，正式西进。¹⁰⁰上文已经提到，孙殿英率军西进本是蒋介石和孙殿英一拍即合而成，其原因之一就是二人都对冯玉祥的「察变」有所顾忌。但随着冯玉祥于8月通电宣布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方面对支持孙部屯垦西北的意愿自然就降低了。

对于中央政府命孙殿英奔赴青海的决议，在整个西北地区掀起巨大波澜。马麟先是对中央政府的决定采取表面欢迎，实则拒绝的态度，而后见中央态

⁹⁸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册）》（台北：国史馆，2005），1933年7月2日条，页7。

⁹⁹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85。

¹⁰⁰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页129。

度坚决，遂组织了一场「青海拒孙请愿大会」进行反对，并在向行政院发出的电报中写道「若秦皇汉武穷兵黩武，开疆拓土之政策，决不适用于已建省区之青海」，¹⁰¹以示反对之强硬。

此时，西北地区的实权人物还有蒋介石任命的甘肃绥靖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朱绍良出生于福建，曾参加过武昌起义、讨袁战争及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又站在蒋介石一方，而后再担任江西绥靖主任并参与「剿共」，至1933年5月，朱绍良才被调至甘肃。¹⁰²朱绍良甫至甘肃立足未稳，便又要面对孙殿英率军西进，自然极不情愿。他一方面致电汪精卫、林森等人，恳请将孙部「从绥西移或予另调」；¹⁰³另一面又严令甘、宁、青三省內不许孙殿英部设立兵站，¹⁰⁴以此抗拒孙殿英。

相较于「青马」和朱绍良，宁夏的马鸿逵则稍显犹豫。据他本人回忆，自己曾在中央决议下达伊始时向何应钦提出过自身的顾虑并请求收回成命，但何应钦以中央命令难以违抗来搪塞。而后马鸿逵又在孙部迫近五原一带时和孙殿英通电，其间，马鸿逵曾以「抗日大义」为名劝孙殿英回古北口抗日并表示自己拥护中央，而孙殿英则执意前往青海履职。无奈之下，马鸿逵只

¹⁰¹ 「青海拒孙请愿大会致行政院快邮代电」，1933年9月，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34。

¹⁰²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919。

¹⁰³ 「朱绍良等致汪精卫电」，1933年7月10日；「朱绍良等致林森等电」，1933年9月21日，分别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30、33。

¹⁰⁴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页132。

能表示「我只好等你来了」。¹⁰⁵但至当年 10 月，马鸿逵态度有所转变，他在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电报中称：「夫孙军屯垦青海，既系奉有中央明令，则其部队同属国军，鸿逵拒诸中途于事为不顺，但朱主任既有严行制止之令，则鸿逵任其入境于命为不忠」，并以退为进的表示希望中央选派官员来宁夏接任，使自己「以不学之身获两全之路，免为乡里之罪人」。¹⁰⁶

而后，马麟也效仿马鸿逵，称中央若不妥善解决孙殿英一事，自己「惟有通电辞职，以谢国人而已」。¹⁰⁷针对于此，蒋介石只得以「隆冬即届，边荒辽阔，冰雪载途，给养困难，大军远行诸多不便」为由令已行至绥远的孙殿英「应即停止西进，暂住原地，再待后命」。¹⁰⁸至此，孙殿英与西北各地方势力进入相持阶段。

孙殿英驻扎绥远期间整军备战，并尝试用各种方法提升实力。首先，孙殿英为扩大军力，设法收编了以杨猴小为首的土匪集团。杨猴小本为绥西悍匪王英的部下，而后王英前往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杨猴小未随同前往，于是自己在当地拉起一支队伍，流窜劫掠甘肃、宁夏各地，深受周围百姓厌恶。孙殿英曾联系王英，欲收编其队伍，但王英已在吉鸿昌手下任职，故只是派遣人员协助孙殿英前往绥西召集旧部，杨猴小等人遂归

¹⁰⁵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页 203-204。

¹⁰⁶ 「马鸿逵致林森等电」，1933 年 10 月 11 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 36。

¹⁰⁷ 「马麟致汪精卫电」，1933 年 10 月 19 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 38。

¹⁰⁸ 「军事委员会第一厅致行政院秘书处函稿」，1933 年 11 月 11 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 40。

顺孙殿英。¹⁰⁹对此，蒋介石曾明确表示不让孙殿英收编杨猴小，但孙殿英阳奉阴违，推说日后将对杨猴小进行围剿，¹¹⁰试图将此事搪塞过去。

其次，孙殿英联络各方，以壮声势。为求自己不被杨虎城与中共部队夹击，孙殿英曾主动联系、拉拢双方。他先是聘任曾在杨虎城手下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担任自己的高等顾问，而后又透过何应钦将被关押的中共高层韩麟符保释出来并委以政训处长之职。¹¹¹孙殿英与杨虎城和中共商定，待时机成熟时三方势力可对「青马」、「宁马」进行夹击，谋夺西北地区，并约定在计划成功后，三方将联名通电表达反蒋抗日的立场。但随着孙殿英随后遭遇的失败，计划也被搁浅。¹¹²蒋介石也曾提醒孙殿英注意部队内共产党员的问题，孙殿英也含糊应付了事。¹¹³除与杨虎城和中共进行实际上的联络外，孙殿英甚至还接受了伪「满洲国」册封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官职。¹¹⁴

此外，孙殿英停驻期间还大肆制售毒品，使用假币，极大的扰乱了驻地的社会、经济秩序。孙殿英生产的毒品不仅对外贩卖，还将混杂了其他成分的罌粟边角料制成「假大烟板子」，分发给手下士兵。据估计，当时孙殿英手下的官兵，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孙殿英又将之前授意日本人铸造的，掺杂了铝的「银元」投入使用。与正版「袁大头」不同，孙版假币上的袁世

¹⁰⁹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页 133-134。

¹¹⁰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 91。

¹¹¹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页 135。

¹¹² 米暂沉，《杨虎城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页 64-65。

¹¹³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 91。

¹¹⁴ 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7》（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页 155。

凯像是睁着眼的，故当时流传着「睁眼的不如瞎子，洋钱不如帖子」的顺口溜。¹¹⁵

「察变」平息后，孙殿英的西进本就没了意义，西北各势力的抗拒也让中央伤透脑筋。然而，此时的孙殿英不仅为增强自己实力而扰乱地方秩序，还同中共沟通联系，自然使蒋介石欲除之而后快。但蒋介石又碍于孙殿英的西进是得到中央的准许，如若反悔，恐有失中央权威。此外，根据朱绍良的汇报，蒋介石对西北地方势力能否抗衡孙殿英也持怀疑态度。¹¹⁶在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表态使事情有了转机。阎锡山本与孙殿英相善，孙殿英停驻包头期间，阎锡山为使其早日过境曾资助他弹药物资，并且在西北各方都明确表示反对孙部西进之时对孙殿英予以鼓励。但这表面的和睦只是建立在孙殿英没有侵害阎锡山利益的基础上，早前孙殿英向中央提出欲往绥西驻垦的计划时，中央曾专门征询过阎锡山的意见，阎锡山怕自己的势力范围受损，遂以「兵多地少」为由加以拒绝。此番孙殿英奉中央命令暂驻绥远，西北各势力又明确拒绝孙部前进，阎锡山对此颇为警惕，生怕自己利益受损，便主动联系中央，表示愿通过武力协助西北各势力解决孙殿英问题。¹¹⁷对此，中央自然乐见其成，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

¹¹⁵ 韩祥符，〈孙殿英在包头宁夏各地的罪行〉，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 23》（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页 103-104。

¹¹⁶ 「甘宁青三省绥靖主任朱绍良转呈马鸿逵呈委员长蒋中正电」，1933 年 10 月 14 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一般资料〉，档号：080200-127。转引自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 90。

¹¹⁷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 86。

3.2 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1934年1月，孙殿英全军开拔，准备进攻宁夏，「四马拒孙」之役正式打响。究孙殿英在此时主动进攻宁夏之原因，大致约为：其一，孙殿英认为自己早前沟通各方，已保证自己无后顾之忧；此时，中央政府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剿共」和平息「闽变」中，无暇西顾，故而孙部只需专一对付西北各个地方势力即可；其次，时值严冬，孙部给养出现困难，不得不发动战争来掠夺物资，此点可从之后孙殿英致行政院电报中得以佐证，其中称所辖部队「困处荒野，进退维艰，衣食缺乏，饥寒叫号」；¹¹⁸第三，宁夏素有「塞上江南」之称，在西北各区域中较为富庶，且盛产罂粟，可大量制作毒品，若占有此地便可使军队获得充足的财政保障；¹¹⁹最后，则是1月黄河进入结冰期，方便孙部过河，倘若转至春季黄河解冻，西北各势力据黄河天堑死守，孙部西进只怕会难上加难。综合以上考虑，孙殿英终于下定决心，通过武力打通自己西进的道路。

1934年1月11日，孙部进攻磴口。针对于局势的恶化，「宁马」首领马鸿逵一面联合「青马」积极备战，一面向上峰请示对策。1月13日，在中央的授意下，由朱绍良领衔，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麒长子、马步芳之兄）等西北要员联名通电，其中称孙殿英「抗命擅动，形同叛逆」，

¹¹⁸ 「孙殿英致行政院电」，1934年1月23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民国档案》，期1（1995年1月），页8。

¹¹⁹ 程一民、李鸿庆，《盗陵将军孙殿英：中校秘书回忆录》，页58。

并表示「应请明加讨伐以肃纪纲」，¹²⁰至此「四马拒孙」的大幕正式拉开。

攻占磴口后，孙殿英继续前进，准备进攻石嘴山。「宁马」方面派出马魁率领骑兵第一团进行防御，同时马步芳也率领「青马」部队前往中卫协防。马魁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在石嘴山刚与孙军接触便佯装败退。孙军追击至平罗城，遂被马魁与驻扎在平罗的马宝琳率军痛击，只得退守到黄渠桥一带。¹²¹

而后，孙殿英进攻李岗堡、清水堡一带，但依旧久攻不克，只得转而攻击宁夏省城。1月27日，孙殿英集结军队，进攻满达桥与大、小礼拜寺一带，但作战不力，反被青、宁联军前来支援的队伍包围。此战，孙军遭受重创，青、宁联军趁势收复了大礼拜寺、谢岗堡等阵地。¹²²

孙殿英违反蒋介石此前命其在原地待命的命令，且自行擅开战端，本就已经丧失了大义，而此时西北诸马中又从孙军降将李殿宝口中得知，孙殿英为扰乱西北，在军中「已委于世铭为青海主席，刘月亭为宁夏主席，甘肃自兼」。¹²³上文已经提到，中央政府早已视孙殿英为累赘，只是碍于令其西行屯垦在先，故不便公开表态制止孙殿英，只能从暗中授意朱绍良及西北诸马对其进行阻击。然而，随着孙殿英私授官职一事败露，中央终于也有理由公开处分孙殿英。1月31日，行政院正式决议「（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

¹²⁰ 「朱绍良致行政院电」，1934年1月13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43。

¹²¹ 陈学浩，〈孙殿英犯宁实记〉，《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卷1期1（1934年3月），页91-92。

¹²² 陈学浩，〈孙殿英犯宁实记〉，页92-94。

¹²³ 「马鸿宾等致各方通电」，1934年1月20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页7。

着即撤消；（二）孙殿英着免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兼职」。¹²⁴至此，中央终于明确表态不再支持孙殿英率军西进，西北各地方势力抗击孙殿英也变得师出有名。

孙殿英被免职后，仍继续率军进攻，但始终无法突破青、宁联军防线。2月10日拂晓，孙军再次出击，进攻省城北部；又派出骑兵沿西南方向包抄，意在扰乱联军后方，但遭到联军骑兵团的围堵。当日，中央派遣飞机对孙军阵地进行轰炸，孙军刘月亭部的指挥所被炸毁。2月22日、23日，孙军连续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但均被击退，至此，孙殿英已无力再组织进攻。孙军残部退至平罗一带，与此前围困平罗的孙军会合，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¹²⁵杨猴小则率部前往李俊堡一带活动，但旋即被青、宁联军骑兵队肃清，宁夏南部已无孙殿英的势力。3月1日，孙军六百余人进攻青、宁联军在赵庄的阵地，联军奋勇反击，孙军再次败退。此役，联军击毙孙军特务营营长杜五岳，打死、打伤孙军约五百人并缴获大量装备。至此，孙殿英已彻底无力抵抗。¹²⁶

3月，中央第一师所辖的袁朴旅达到宁夏，联军正式组织反击。19日，联军正式出击：袁朴旅为中央纵队；第三十五师旅长马玉麟率领一〇三旅及第九师二旅三团构成左翼；第十五路军旅长卢忠良率第一旅与第二旅四团为右翼；十五路军第三旅为预备队，保安处处长马全良负责省防与南路警戒。

¹²⁴ 「行政院撤销西垦屯办公署免孙督办兼职电稿」，1934年1月31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页7。

¹²⁵ 陈学浩，〈孙殿英犯宁实记〉，页95-96。

¹²⁶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页150。

战争开始后，「宁马」的马魁、马培青部骑兵猛力冲击，「青马」的马元海部则负责对孙部进行迂回包抄。孙军一触即溃，联军一路追击。25日，联军追击至河拐子，遂以「因驻有晋军骑兵三团」为由，停止追击。¹²⁷此后，除杨猴小继续率军逃窜外，孙军残部陆续向晋绥军缴械投降，至31日孙部武器「全部缴清，未留一枪一弹」，人员「尽成徒手分向后方陆续遣送中」。¹²⁸孙殿英本人则早在3月23日前就脱离军队前往磴口，¹²⁹于27日又辗转前往大同。¹³⁰而后中央在阎锡山的斡旋下对孙殿英宽大处理，同意其在太原晋祠隐居。¹³¹至此，「四马拒孙」之役遂以孙殿英的失败而告终。

四、战后分析与影响

4.1 战后分析

纵观「四马拒孙」之役，其中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在此笔者将此事件及其爆发的前因后果进行复盘、分析，以探究其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

首先，先来分析战争的发端。上文已经提及，孙殿英与西北各地方势力交战，本出乎各方的意料，但事情发展到争端无可避免，笔者认为其原因如

¹²⁷ 「马鸿宾等致各方通电」，1934年3月25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页18。

¹²⁸ 「傅作义致汪精卫等电」，1934年3月31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页19。

¹²⁹ 「何应钦致蒋介石等密电」，1934年3月23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页18。

¹³⁰ 「何应钦致蒋介石急电」，1934年3月28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页19。

¹³¹ 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文史资料选辑 7》，页157-159。

下：

其一，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对孙部处置不当。前文已论及，「察变」平息后，孙殿英部成为「弃子」，但对于如何处理孙殿英，蒋介石始终持一种「得过且过」的暧昧态度。孙殿英获命担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时值 1933 年 6 月下旬，真正率部西进则要等到当年 9 月下旬；而当年 8 月初，冯玉祥通电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变」就此落幕。由此可见，中央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来重新思考如何安置孙部之相关事宜，加之其间孙殿英亦不断推诿自己部队装备不足，钱粮短缺，借机向中央勒索，故此时，若中央欲维持和平，则可阻止孙殿英西进，令其于原驻地待命，或另往他处任职，甚至可以调至长城沿线防备日军，借日本人之手削弱孙部；若中央欲武力解决孙殿英，则可借孙殿英此时势力较弱，西北各势力对其西进感到不满之际下令围剿。然而，中央还是为了顾及自身权威，不愿朝令夕改，故错过最好时机，不顾西北地方势力连番反对，准许孙殿英西进。直至孙殿英行进五原，战争一触即发时，中央方才醒悟，命其原地待命。但此时，孙殿英已做好战争准备并先行进攻宁夏，事情发展彻底超出了中央的控制，战争已无可避免。中央直至 1934 年 1 月底才正式表态令围剿孙殿英，至 3 月底才将孙部肃清，此时距中央初令孙殿英前往青海屯垦已近一年矣。

其二，中央对西北地区控制不当。上文屡次提及，孙殿英屯垦督办一职是受中央政府任命的，其率军西进也不过是前往青海履职。西北诸马及朱绍良加以阻挠，实属违抗中央命令。在孙殿英接受委任后不久，马麟就致电中央表示抗议中央此项决议，甚至以「孙氏必欲西来，民意军心，实难抑制，

万一事出意外，不仅关青海之治安，西北从此多事矣，重击中央之忧」来对中央进行软性威胁。¹³²彼时中央已经取得对甘肃省的控制，无论朱绍良还是其前任邵力子，都是由中央直接委派，并且蒋介石早已于 1933 年 2 月调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入甘。胡宗南部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装备精良，且具有权威。据学者分析，胡部「如果要消灭甘肃任何一部地方势力，不仅轻而易举，而且名正言顺。因此，境内各小军阀纷纷投诚，即使雄踞一隅的青海马步芳亦不例外。」¹³³总而言之，中央如果能毫不犹豫，明确表示支持孙殿英西进，则无论「青马」、「宁马」都不敢造次。唯有刚刚赴任的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可能会因自己根基维稳就坐视孙部入境而感到不安，但因为中央军的存在，孙殿英亦不敢轻举妄动，故而中央若能加以安抚，则朱绍良也不会成为孙部西进的阻力。

其三，孙殿英自身摇摆不定的态度，也为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孙部行至五原附近，中央已明确下令让其暂驻当地待命，但再中央未作出进一步决策之时，孙殿英擅开战端，并且与各方暗通款曲，意欲割据西北而反抗中央，这也坐实了此前认为其是「假屯垦、真图存」的猜测。孙殿英本是奉命西进，但最后却自己抛弃了大义名分，最终招致了各方的围剿。

就结果论，战胜各方都得到一定的收益，但最大的赢家无疑是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集团。阎锡山一面在孙殿英西进前好言安抚，一面又在孙部停

¹³² 「马麟致林森等密电」，1933 年 6 月 30 日，收录于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页 28。

¹³³ 柳德军，〈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权力渗入与甘肃政局之演变〉，《宁夏社会科学》，期 1（2017 年 1 月），页 174。

滞不前时秘密上报中央表示愿出兵讨伐，最后则待战役接近尾声时才出兵接受孙军残部，收缴孙军装备。故而整场战役，阎锡山出力最小，收益最大。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四马拒孙」之役只是消除了一个威胁，真正的获益有限。笼统来说，「四马拒孙」之役的胜利无疑会稳固西北各个地方势力的统治。但对于「青马」家族而言，其影响更为深远，笔者亦将于下一小节进行论述。

在「四马拒孙」之役中受损的，除去战败的孙殿英外，莫过于绥、宁两省的民众。上文已提及，孙殿英在停驻五原期间兜售鸦片，并用假币扰乱当地经济，当孙部前进至宁夏，擅自开战后，其对百姓的滋扰更为严重。彼时宁夏共辖十县，所需供养的部队只有「宁马」部的五六万人。但随着战役的展开，孙殿英部、「青马」部及中央军第一师陆续开往宁夏，该省驻军人数顿时达到平时的三倍，无疑大大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再加上孙部军纪废弛，素有恶名，大量百姓为躲避战乱不得不背井离乡，一时间灾民竟达到七、八十万。¹³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马拒孙」之役虽是由孙殿英主动挑起，但根本原因还是要归咎于中央政府事前考虑不足，遇到突发情况又优柔寡断。战争爆发，中央军协同西北各势力与孙殿英苦战获胜，可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最后却被晋绥军渔翁得利，攫取胜利果实。但正如《潼关怀古》中的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讲的那样，无论谁胜谁负，对于受战役波及的普通民众而言，留下的徒有战争创伤而已。

¹³⁴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页 160。

4.2 对「青马」家族及其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影响

作为「四马拒孙」之役的胜利方之一，「青马」家族虽未像晋绥军那样坐收渔利，但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战果。首先，随着孙殿英部被剿灭，「青马」家族不必担心其他势力进入青海动摇其统治；其次，「青马」虽出兵、出力良多，但战争的范围始终没有波及到青海本省，也可算御敌于「家门」之外；最后，「青马」也在战争中缴获了一批军用装备，¹³⁵得以借此扩大军力。

但除战争获益外，「四马拒孙」之役对于「青马」家族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第一，是中央政府对「青马」家族的态度，由战前的无视其意愿强行调兵西进改为对其进行安抚、拉拢，甚至妥协。1934年1月，「四马拒孙」之役尚未结束，蒋介石授意朱绍良组办西北建设促进会，马麟位列委员。当年4月，「四马拒孙」之役已然落幕，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以「视察实业」为名前往西宁，对「青马」进行安抚，并赠给「青马」要员及青海各大宗教寺庙大量礼物。5月，宋子文又访问西宁，期间不仅与马麟、马步芳叔侄会晤，还拜谒了西宁东关大寺和马麒墓，并承诺将由中央拨款给青海一笔开发经费，马麟也递交了一份《青海建设计划》作为回应。¹³⁶10月，蒋介石亲自飞赴兰州视察，再次召见马麟、马步芳叔侄。一年之中，四次优待，三次视察，其中安抚、羁縻之味不言自明。11月，蒋介石拟调马步芳部换防他处，同时又向甘肃增兵。马步芳深感惶恐，遂屯积钱粮，购买装备，并称中央对其不信任。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令朱绍良进行安抚，并解释甘肃增兵纯属为防备共

¹³⁵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青海三马》，页137。

¹³⁶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青海三马》，页98。

军，与「青马」无关，还称愿「青马」与中央军协力配合围堵共军，无意将马步芳部调往别处。¹³⁷通过本段论述，「四马拒孙」之役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青马」态度明显软化，其首要目的是欲借助其武力「剿共」。但同时笔者也认为，正是「青马」部队在「四马拒孙」中展现出的战斗力，以及孙殿英联系各方意图割据西北的先例在前，使得蒋介石颇为忌惮，只能以怀柔的姿态对待「青马」。此后，「青马」也不负蒋介石厚望，直至 1949 年国府迁台前都作为「剿共」的马前卒，一直活跃在国共内战的第一线。总之，对比此前，「四马拒孙」的意外爆发与「青马」取胜的结果成为「青马」与中央关系发展的转折。

第二，「四马拒孙」之役对「青马」家族首脑更替产生影响。前文已经提到，马麟虽担任青海省主席，但马步芳掌握着青海的实际军权，二人素有间隙。马麟上任时虽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在「雷马事变」中首鼠两端，通电支持吴佩孚，惹得中央怀疑；孙殿英获准率兵西进后，马麟又带头表示反对中央命令，甚至还对中央还以威胁之辞，这一切引得蒋介石颇为不满。反观马步芳，作为「青马」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在平定马仲英叛乱、青藏战争及「四马拒孙」之役中都取得了胜利，声望与日俱增。加之马步芳取胜的这几场战役也都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有的战役甚至出现「青马」部队与中央军协同作战的情况，故马步芳自然慢慢地受到蒋介石的青睐。马麟本就不善于管理经济，此前发布的「青海省金库维持券」不断贬值，无奈之下只得于 1934 年改发总面值 80 万元的「青海省临时维持券」充当青海省货币。马步芳

¹³⁷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页 110。

本就对马麟不满，于是趁组织工匠，于周家泉花园内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被马步芳一面用来套购物资，一面用来充发军饷。彼时时值「四马拒孙」之役前后，青海省内本就物资缺乏，混乱不堪，马步芳此举无疑使青海省经济雪上加霜。1935年，马麟再次发售面值总计100万元的省钞，但此举直接导致青海物价通胀。马麟不得已于同年10月下令允许将省钞以银元形式兑现，但仅5日内就兑换出130余万省钞，青海省政府只得又宣布停止兑现，至此马麟所发行的省钞彻底沦为废纸，青海金融崩盘在即。马步芳趁机煽动群众，在马麟每日前往省政府上班途中拦路请愿，又借掌握军权之利，拦住隶属于马麟的商队强行加税。至此，马麟已无法在青海省继续执政，遂于1936年8月向中央请求休半年病假。随后，马麟先后前往上海、南京，会见国民政府要员，同时向蒋介石状告马步芳对自己的屡次迫害。蒋介石未正面表态，而是批准将马麟延期5个月，拨发旅费1万元，准许其前往麦加朝觐。此时，青海政务已由马步芳代理，马麟在青海省内已彻底失势。1937年马麟回国，仍欲回青海担任省主席。但马步芳大权在握，自然不愿放权，故又对马麟进行滋扰，甚至公然派兵进入马麟宅邸偷盗财物。¹³⁸同年，白崇禧奉蒋介石命前往青海考察，其间马步芳施以贿赂，白崇禧返回中央后遂大力替马步芳运作，至1938年，马步芳正式被中央任命为青海省主席。¹³⁹至此，在「四马拒孙」余波的催化下，「青马」家族进入了马步芳时代。

五、结论

¹³⁸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青海三马》，页96-100。

¹³⁹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页935。

自马麒初创「青马」雏形，至马步芳取得青海省统治权，「青马」家族的发展与其同中央政府的关系都历经反复。马麒脱离马安良部自立门户，其后则一直为巩固自己家族对青海的统治而奔走，但随着冯玉祥势力的西进，马麒不得不蛰伏以求自保。但马麒始终对冯玉祥持有敌意，其间甚至不惜以煽动同宗的马仲英叛乱为代价，以求自己可以趁乱得利。随着冯玉祥先后参与北伐战争与中原大战，其对西北的控制力持续下降。加之，此前冯玉祥曾促成了青海独立建省，马麒终于得以担任青海省主席。马麒死后，马麟接管青海省政权，但军权则由马步芳掌控，故二人不睦。及至「雷马事变」，马麟表现令中央不满，中央也趁势取得了对甘肃的控制。在随后爆发的青藏战争中，马步芳指挥「青马」军取胜，稍稍挽回了中央的好感。其后，孙殿英奉命西进，马麟表示反对，「四马拒孙」之役在出乎各方预料的情况下突然爆发。战后，中央与「青马」关系缓和，马步芳也趁势成了「青海王」。由此，笔者认为「四马拒孙」之役对于「青马」家族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起到了具有偶然性的扭转作用。论及至此，我们可以先来假设假使没有「四马拒孙」之役，青海地区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

纵观当时的形式，此前盘踞与西北地区的冯玉祥势力已经土崩瓦解，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委任甘肃省主席，并且借机令中央军第一师进驻甘肃，以稳固中央对该地区的实际统治。此时，西北各地方势力已无力与中央抗衡。至于「青马」方面，其实力虽较冯玉祥主掌西北时期有所长进，但经过整合后的中央政府实力远非当年冯玉祥可比；而马麟的外交手腕逊于马麒，屡次惹得中央不满；青海省内军权被马步芳把持，马麟无法调集军队。综上所述，

「青马」其时处于内忧外患中。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就算中央顾忌民族、宗教感情，无意用武力彻底消灭「青马」势力，但效仿此前的冯玉祥对「青马」进行打压还是绰绰有余的。但随着「四马拒孙」之役的爆发，与中央军协同作战的「青马」部队展现了其战斗力。同时蒋介石获悉孙殿英曾与杨虎城及共军有所勾结，虽然孙殿英已然兵败，但其仍对另外两个势力有所顾虑，遂转而安抚，扶持「青马」。「青马」由此转危为安，统治青海直至 1949 年。

但对于「青马」内部的权力更迭而言，「四马拒孙」之役的胜利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催化作用。「四马拒孙」之役后，青海省内财政负担加重，马麟自身能力不足，又屡次招惹中央。反观，马步芳执掌军权，又战功赫赫。因此就算马步芳未借「四马拒孙」之役前后的青海省财政危机发难，马麟被取代也只是时间问题。

故综合以上两点，「四马拒孙」之役的胜利对「青马」家族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但如同「四马拒孙」之役本身的爆发一样，其对「青马」家族的影响也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参考资料

一、官修史料、档案、回忆录等

(一) 文史资料

韩定山，〈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局〉，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页 32。

韩祥符，〈孙殿英在包头宁夏各地的罪行〉，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 23》。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页 103-104。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变〉，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 139-144。

吕配懿提供，金沛仁说明，〈雷马事变前后马文车之函电稿〉，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 165。

马丕烈，〈马仲英起事与三围河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 89。

孟企三，〈我对孙连仲主青主甘期间的一些回忆〉，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64，页 81。

宋干臣，〈马仲英、马步元屠杀湟源县记略〉，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4》。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 122-124。

张慎微，〈雷马事变见闻〉，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21》。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页 126-127。

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7》。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页 155。

《青海三马》史料编辑组，〈青海战争的内幕〉，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14》。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 131。

（二）档案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册）》。台北：国史馆，2005。

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历史纪要》。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青海三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十七册）》。台北：国史馆，2005。

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期4，1994年10月，页27-44。

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编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民国档案》，期1，1995年1月，页7-19。

（一）回忆录、年谱

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版）》。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程一民、李鸿庆，《盗陵将军孙殿英：中校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刘凤翰，《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1993。

马鸿逵，《马少云回忆录》。香港：文艺书屋，1984。

（四）职官年表

刘寿林、万仁元、王文玉、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北京：从中华书局，1995。

二、近人著作

（一）论文

陈学浩，〈孙殿英犯宁实记〉，《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卷1期1，1934年3月，页91-92。

陈兴唐、韩文昌、潘缉贤，〈冯玉祥与甘肃雷马事变〉，《民国档案》，期3，1995年7月，页98。

胡平生，〈政治权谋与战争创伤——一九三四年「拒孙之役」始末〉，《台大历史报》，期36，2005年12月，页154。

柳德军，〈20世纪30年代中央权力渗入与甘肃政局之演变〉，《宁夏社会科学》，期1，2017年1月，页174。

刘东社，〈「四马拒孙」之役新论（上）〉，《陕西教育学院学报》，卷19期1，2003年2月，页37。

毛光远，〈蒋介石对西北诸马军阀军事控制与反控制〉，《甘肃高师学报》，卷15期3，2010年7月，页111。

王立本，〈八十年代以来青海史研究回顾：以 Merrill Ruth Hunsberger 《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一书为中心的讨论〉，《辅仁历史学报》，期16，2005年7月，页326-328。

王立本，〈国共内战在西北——从陕西鏖兵到兰州对决〉。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05。

王玉贵，〈马麟、马步芳叔侄相争〉，《民国春秋》，期2，1998年3月，页4。

张嘉选，〈卅年代宁夏「四马拒孙」历史真相刍议〉，《青海民族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1，1990年1月，页36。

郑国良，〈中央与地方—国民政府与青海马家关系研究(1928-1945)〉。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7。

（二）专书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

陈少校，《西北军阀记》。香港：致诚出版社，1981。

高文远，《青海建省的奠基者——马麒》。台北：青海省旅台同乡会，1990。

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马光宗等，《中原大战中的马鸿逵、宁夏三马》。北京：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8。

默利尔·亨斯博格著，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略》。兰州：甘肃文史编辑部，1989。

王立本，《决战大西北——剖析国共内战之西北战场（1945-1949）（上）》。

台北：老战友工作室，2011。

王玉贵，《西北马家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马步芳家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许宪隆，《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张中复，《清代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